

王学泰 著

往来成古今



中国青年出版社

王学泰 著

往来成古今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来成古今/王学泰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5
(视点文丛)

ISBN 978-7-5006-9900-2

I. ①往…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0567 号

责任编辑：万同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57350404 门市部电话：(010) 57350370

保定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7.25 印张 2 插页 234 千字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代序：读也匆匆，写也匆匆

2009年几乎是被报刊媒体赶着走的一年。谈书，谈读书文章写了一二十篇，还把过去谈书的文字编为一集，交出版社出版，整整一年，没离开书。本来设想要在本年结稿的一本书也有泡汤的危险，年底了《中华读书报》编辑又来约稿，似乎是要给这一年的与书打交道的生活画个句号了。这一年尽管忙，也还在网上买了几次书，也抽空读了几本书，写写读书的感受还是有本钱的。

连续好几年了，通俗史学热度始终不衰，通俗史书的出版也很火爆。本来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人们喜欢读史、讲史是件顺理成章的好事。“文革”当中，割断历史，一提历史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须用铁扫帚，把他们从舞台、出版物、一切历史遗迹，乃至人们的头脑中扫除得干干净净。邓小平曾说，中国历史那么长，可以编成历史剧，一年360天，一天演一本。“四人帮”批他反对“样板戏”，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重新占领舞台。看了报上的大批判，我曾说：“一年365天，邓小平主张演360天历史剧，不是还给样板戏留了5天吗？”于是，整我时，这也成了一条反动言论。

现在非历史的“历史剧”大有要搞365天的趋势。这不是说这类书出版过多，也不是说这类戏太多，关键是对历史往往采取了非历史的态

度,放肆恶搞。胡编乱造尚且不说,而且吹捧过度。正像张鸣所说的一些研究者研究什么爱什么。不是爱历史这个事业,而是爱研究对象。研究秦始皇的,就说他是千古一帝;研究雍正的,就说他是皇帝里的劳动模范。缺少客观的态度,丧失了史学精神,弄得年轻人也沉迷其中,竟然讨论我们到底生活在哪个时代好?年初读了一本历史随笔《中国好人》(作者刀尔登)其中有一段说得很有趣:

历史爱好者喜欢的一个题目,是“你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自己在想象中的身份。要是想当皇帝,清朝最适合你;要是做农民,哪个朝代都差不多。文人喜欢宋朝,士兵怀念晚唐或五代。如果想当宦官呢?这不太像个好志愿,不过,万一有人心怀这样的抱负,我建议他回到明朝。对女性来说呢?不知道。

——《放纵的权利》

这是很实际的。你是个平民百姓,在哪个时代也不会太舒服,特别是作者说的“不知道”的女性,更是人下人。从秦始皇以来,中国进入皇权专制社会,平民百姓是根本无权的,太平时代,有口饭吃,大约问题不大,生存权能够保障,但不能有独立自主的精神追求,如有必然碰壁;至于乱世,命贱如蝼蚁,连生存权也不要想了。《中国好人》中的文章短而精,有不少精彩的议论。作者比较客观看待历史,书中不乏真知灼见。

历史热仅限于古代,至于近几十年历史似乎在出版领域消失了。承朋友告知《七十年代》出版了,可以看看,此书记录许多30年前的事,这似乎是个特例。本来打算买一本,可是到院图书馆一看,原来已经上架,一大厚册。翻开一看,基本上是生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知青的作品。这一代人,主要是两个记忆。一个是革命的记忆;一个是被抛弃的记忆。我比这代人大10岁,“七十年代”给我留下的只是被革命的记忆。比如在70年代初的“一打三反”中,战战兢兢,总算逃过一关;但没有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关,被请进了K字楼。《七十年代》中张郎郎的《宁静的地平线》中许多场景是我所熟悉的。我与张郎郎曾有两面之

缘。还是30年前了，那时他在《美术研究》编辑部做编辑，骑着辆旧自行车四处组稿。在白石桥碰到他一次，聊得比较长的是在京剧院齐治翔家。听他讲遇罗克在半步桥23筒（就是文中所说的“死刑号”“枪号”）的遭遇与表现，在座者无不感慨歔歔。我与遇罗克是高中同学，一起在校文学组共事两三年，很熟，所以张郎郎对罗克事迹叙述，更使我悲慨莫名；时过30年，这次读《宁静的地平线》仍然很震撼，这篇文章使我打破了10点半以前入睡的习惯，过了午夜，仍未成眠。

文中还提到了沈元，这也是我早就知道的。他是“学部”近代史所的研究人员。1957年沈元还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私自翻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被划为右派，开除学籍，后来摘掉帽子，在家里和北图自学，写了篇历史论文《〈急就篇〉研究》，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急就篇》是汉代识字课本，但从中所排列字词里可以考证汉代一些社会情况。这篇文章从选题到分析过程在50年代看来都有新意，受过郭沫若的表彰。困难时期，社会控制较松，近代史所所长黎澍很欣赏沈元，把他收进所里，而且提倡青年学者向他学习，认真读书，开拓思路。北大历史系有些人对近代史所任用“摘帽右派”沈元，而且《历史研究》接二连三地发表他的文章，有的文章还被《人民日报》转载，特别生气，告状到毛主席那里。“文革”一来，这是近代史所了不得的大事。“革命派”指出，这与毛主席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唱反调。于是，不仅黎澍受批判，作为黑典型的沈元也没有好果子吃。沈元受不了，化装成黑人，跑到苏联大使馆要求避难，不料一个到苏联使馆办事的非洲外交官员把他送给使馆门外站岗的中国警察，这样，他也进了半步桥的23筒。通过张郎郎对他的描写，我第一次了解到沈元在监狱的情况，他是在发了神经病后被枪毙了。1974年，我在琉璃厂海王村淘旧书，曾买过一本王杖的《严复传》，是本很薄的小册子。扉页上有沈元的印章和签字，我想这是沈元死后，其书流散到了琉璃厂，我买下了。书后有沈元题写的一行小字“作者没有学力评论严复”，从这句话可见这个年轻人的自负。“四人帮”倒台后，沈元平了反。2008年沈元在美国的一位姐姐来北京，到近代史所问沈元事和想要他遗留在所里的东西，所里的老研究员刘志琴先生曾经写过关于沈元的文章，与沈元姐姐见面。刘先生与我是邻居，说及此事，我把那

目 录

代序：读也匆匆，写也匆匆	1
《论语》在文化史中地位的演变	1
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再说游侠	55
江湖侠骨已无多	
——中国的游侠精神到西汉为什么没落	65
科举制度的本质	74
吏胥之害	78
从一本书看满洲统治者汉化政策的成功与失败	86
说大赦	96
模糊千年的一条民事法	103
说跪拜	113
说 粥	118
清明节的变异	123
清中叶的畅销书《随园诗话》	126
《闲话藏书》的闲话	129
从“不怕鬼”到“不怕兔”	133

聂绀弩诗与旧体诗的命运	138
三十年来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147
听“老盖仙”说为人处世	152
老北京的幽默	157
知识分子曾经达到的高度	171
写在历史的边上	
——读《中国好人》	174
审视清代会党泛滥的新角度	
——评《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	179
1963—1966年大陆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	184
续“洗澡”	197
野驴顾惟乔	207
我读的“第一本书”	214
读书生活的转折点	218
由酷暑而想到……	223
鸿爪掠影(一)	226
鸿爪掠影(二)	238
号子里的战争	
——评《号子里的人》	266

《论语》在文化史中地位的演变

一、开头的话

倡导“读经”已经有好几年了，其实真正认真读读儒家经典著作的并不很多，佶屈聱牙的《尚书》，说着好玩，其实玄奥的《易经》，古人盛赞“微言大义”，今人不知就里的《春秋》，烦琐细微的《仪礼》《周礼》……没有多少人硬着头皮去碰，闹得特别红火的也只是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在读《三字经》，本来古文、文言在大陆已经冷落有半个世纪了，能够点断文言的人已经很稀缺了，线装书只是作为“文物”“古董”，其价格在不断飙升，其使用率却在大幅度下降。我所在研究单位的线装书库很少有人光顾，当然这与近些年不断大量出版各种古籍标点本、校订本、笺注本、选本也有关。

不过最近“读经”热点有从“三、百、千”向《论语》发展的趋势，《论语》勉强可以算作“经”。这大约与于丹女士在央视的《百家讲坛》上大力弘扬有关，她是一位被誉为“《论语》功臣”的女教授。她以自己的语言魅力，让彷徨于多种苦闷中的民众发现了原来中国古代还有一本能够抚慰人们心灵的图书——《论语》。《论语》本来如“布帛菽粟”凡是读书人都不能不接触的，只是因为近年来人们疏于读书，它才变得陌生起来。

思想解放时反思运动这两个时段。前者把孔子等同于“现行反革命”；后者则把现存的许多社会问题皆归咎于传统，特别是孔子。对孔子和《论语》的神圣化则有 2000 余年了，最近又有沉渣泛起的趋势。李零的书有些超然，用他的话说就是因为经过“文革”，对“热闹”^①，抱有警惕。

1. 从内容上看：《论语》是本纪念册

《论语》在过去是“十三经”之一，被视为是记载圣人行迹的经典。其实就《论语》的原始意义而言，它应该是本纪念册，是孔子去世后弟子（包括再传弟子）为追念恩师所编纂的恩师言行录。

孔子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伟大教师，他第一个把官学办到民间来。在他之前，教育基本上是被贵族垄断的官学，孔子则是“有教无类”，只要你交得起一小束干肉条（束脩），就可以跟孔子读书。传说他有 3000 弟子，72 贤人。许多弟子追随他数十年。那时的教学方式不是老师讲、学生听，满堂灌；而是师生相对，论道授业，有如朋友，孔子又是一位性情温和、博学多能、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老师，师生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孔子去世后，许多弟子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恰恰弟子有若外貌酷似孔子，“弟子相与公立为师”，同学们请有若扮演孔子，来做他们的老师。这个现在看起来是很搞笑的事情，在先秦却被视为平常。因为周代以来，在祭祀死去的先人时，因为没有画像，“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也就是说找一个与死者相似的人做“尸”，祭祀时，“尸”做神主，向他祭拜。“尸”还常常是死者的孙子，也就是说儿子高高端坐在神位上，接受父亲的祭拜。后来，神主和画像流行后，用“尸”的习俗遂废。仅仅长相像孔子的有若毕竟缺少内在的力量，如果让他充当一时之“尸”还够格的话，长期“演”孔子则不行，弟子们把他赶下了老师的座位。从这个故事可见弟子对老师思慕之深。后来他们找到了追念老师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编一本纪念册，把孔子与他们的谈话、对他们的教导记录下来，想念恩师时就可以看一看。弟子们的记录、回忆录编纂在一起，就有了《论语》这本书。

^① “热闹”这个词用得好，许多的“热”都借助于“闹”，不“闹”很难把热度提上去。现在科技水平提高、媒体发达，很便于“闹”，许多“热”都是“闹”出来的。

这一点。他说《论语》中对孔子诸弟子皆称字，唯有说到曾参、有若称“曾子”、“有子”，有若扮演过孔子，属于例外，而对曾参的特别尊重，说明它的编纂者有可能是曾子的弟子。

我们从《论语》的字面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論”从“侖”，而“侖”上面的“亼”，读作“集”，意义相近，下面的“册”，就是册。因此“侖”字就是将许多竹简集合在一起的意思。每个弟子都把自己的记忆写在若干竹简上，编为一册，把许多弟子的回忆，也就是许多“册”竹简編集在一起就是“侖”（侖），也即“论”。

汉代把这类有关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记录的书都称《论语》。《汉书·艺文志》中著录《论语》流行本子和《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记》（孔子朝见鲁哀公）、《孔子徒人图法》（孔子弟子图像）之后说“凡《论语》十二家”云云。可见当时凡与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生平有关，对孔子有纪念意义的都可称《论语》。

认识到《论语》是众弟子、再传弟子为怀念师尊而编纂的，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孔子说的一些非常浅白的话也记了下来。如《乡党》篇中所说的：“饭馊了，鱼肉臭了，就不再吃了”（食馊而謁，鱼馁而肉败，不食）；“食物颜色不对了，不吃”（色恶，不食）；“食物有味了，不吃”（臭恶，不食）；“饭没有煮熟，不吃”（失饪，不食）等。这些都是大白话，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但记录者还是不厌其烦地记录着。《论语》还有一些自相矛盾的话，如一会儿说《诗三百》的特点是“思无邪”；一会儿又说“郑声淫”“放郑声”。批评郑诗中有过度柔靡的声音，应该离它远点。“郑风”是《诗三百》的一部分，它到底是“思无邪”还是“淫”？可能是孔子在不同时候针对不同问题说的，弟子各记各的，各有道理。孔子还说过单独看来不太高明的话。如说“不要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勿友不如己者），如果人人如此，世界上就没有朋友了。孔子谈此问题时，必有针对性，没记录具体环境，这成了一句傻话。从《论语》这些瑕疵也可见这些记录不是出于一人之手，也不是为记录而记录，其中必有感情的寄托。

因为许多人都在记，而且人已去，音容不再，记录保留越多越好。因此这种记录就会显得芜杂，一些没必要也留了下来；见闻异词的，两方的记录都保存了下来。这些流传到后世，给后人以“哥德巴赫猜想”机

会,绞尽脑汁为孔子打圆场。后学们不知道弟子各个拿出自己的记录,更多是要从中重温老师和自己相处日子的温馨,并非要造神、造圣(这一点我不太同意李零的意见),因此不必尽选“高大全”的语录,而有什么就保留什么。另外,那时由于记载工具的限制,不可能动辄千百言,可以把话语的环境背景说得一清二楚,只要把老师所言记下来,弟子们就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就可以回到当时的氛围。对后世的读者来说,由于背景模糊,读《论语》则不免像盲人摸象一样地胡猜。现代读《论语》更多的是要体验,注释者责任在于尽量详尽地提供当时的背景资料,而不是依靠荒诞的、不能反映当时情势的想象,用于补经文的不足。

2. 从装帧形式上看:《论语》是袖珍本

现在一提到“经”给人们以庄严肃穆的感觉,实际上,“经”在纺织上只是条条竖线,横线叫“纬”。没有“经”,“纬”无所依托,因此,汉代被命名为“经”的应是朝廷最重视的文献。今文学家^①认为只有孔子亲手所订之书才能称做“经”^②。而古文学派的章太炎先生则认为《诗》《书》《礼》《乐》皆周代官书,《春秋》史官所掌,《易》则太卜所藏也属于官书,而“官书用二尺四寸之简书之”,所以称做“经”^③。

经过秦末的战火,政府所藏之书无几。汉惠帝时朝廷正式废除秦始皇三十四年实行的“挟书之律”(禁止民间藏书),民间违法私自收藏的书籍才逐渐显露于世。最初出现的还是儒家传播的《尚书》《诗三百》《周易》等。从汉文帝开始首先把“诗”(诗经)立为官学,主管的学者称为“博士”。《困学纪闻》说“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④。后来不断有儒家经典被立为官学,如《尚书》《周易》《春秋》《礼》等,这些加上《诗》,遂有“五经博士”之说^⑤。因为这些儒家传统教育用书,仿照周代被立为官学,其书便被称为“经”了。

汉代凡是重要的文献、官书用二尺四寸的竹简书写,那时大多文献

-
- ① 关于经学的今古文问题后面再讲。
 - ② 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
 - ③ 见章太炎《国学讲义》,海潮出版社,2007。
 - ④ 转引自《经学历史》。
 - ⑤ 时在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

是写在木简和竹简上,高级一点的写在绢帛上。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①中引汉代经师郑玄《论语序》云:

《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此则专之简策,当复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

这里所说是指汉代儒家经典书写在竹简上的长短尺寸。《春秋》属于“经”,简长二尺四寸(汉尺,合48厘米)。《孝经》为汉人所著,低了一等,短了一半。文中所说的“专”即“传”,“传”是指解经文字(如《春秋》的注释文字的《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都称“传”)用六寸的简来书写,比《孝经》又短了一半。而《论语》则用八寸的简书写。章太炎还说:

古官书皆长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举成数言,则曰“三尺法”。经亦官书,故长如之。

也就是说,凡是官家所发布的书籍都写在二尺四寸的竹简上,“经”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就连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简策,其规格也是48厘米(二尺四寸)和24厘米两种。即使是书写在绢帛上也分为48厘米和24厘米两种,用整幅或半幅的帛,横放直写。可见,当时书籍虽非印刷出版,但即使抄写也要遵从社会上共同遵守的格式。因此,简单地说“经”“传”等最明显的分别还是个“开本”大小问题。这种规范只是到了汉代才严格起来。最近清华大学获赠的先秦楚简,据报道说其内容多为《尚书》《竹书纪年》之类,其长度由46厘米到10厘米,对官书的尺寸规定还没有汉代那样严格呢。

与社会流行的长达二尺四寸的大书比较起来,正像李零所说的《论语》只是个“袖珍本”的小书(河北定州八角廓村西汉刘休墓出土的《论语》竹简更短,仅有16.2厘米,合汉尺七寸),按照皮锡瑞说法是“《论语》记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于弟子撰订,故亦名之为传”。这是今文学派

^① 见《章氏丛书》,上海古书流通处,1924。

学者的意见。但东汉的王充在《论衡·正说》^①中言：

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记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记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记识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

从这段文字可知，《论语》在最初写作编纂时就已经是“八寸”本了。当初孔子的弟子共同记录的孔子的言行，他们受教时间长，需要记录的文字多，有几十几百篇，以八寸为一尺（周尺为汉尺八寸）的竹筒记录，是为了记录简便，怀藏携带方便。《论语》不是作为经书留存下来，而是怕忘记而作为传文记录下来的，所以只用八寸为一尺的竹筒来记录，而不用写经书用的二尺四寸长的竹筒。汉朝兴起时《论语》失传了，汉武帝时拆毁孔子旧宅，武帝派人取视孔子壁中的古文，得到古文《论语》。

当时这类记录孔子言行的小书当有多种流行，“郭店楚简”中就发现了许多接近汉尺八寸的短简，被编成《语丛》四种。第一至第三，皆属于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不少孔子或其传人的语录。它们与《论语》不仅在形式上相似，语句上也有相近之处。

为什么这里强调《论语》是袖珍本？作为官方发表的文书和“经”长达48厘米，与现代个人用书桌的宽度差不多了。南北朝以前没有桌子，看书或放在案子上，或拿在手上，长达半米的书只能放在案子上须要正襟危坐（当时的“坐”接近现代的跪，只是臀部坐在蜷曲的小腿上）地看，读书很累。而“袖珍本”则不同了，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仅16.2厘米，比现在的小32开的书还短一些，拿在手中或坐或卧，甚至箕踞（伸直两腿成八字坐着）都可以看，也可“隐几而坐”（靠着木几）舒舒服服地看。虽然其庄重性大大降低了，但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它更“人性化”了，与读者更接近了。

^① 《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

《千字文》),然后是《神童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一类通俗读物。如果上学正规,儿童聪明,这些不用两年就能读完,跟着就读“四书”,从《大学》《中庸》开始,接着就是《论语》,学童一般还没有到10岁,此时儿童读《论语》已经不像汉代容易了。因为时间过去了1000多年,口语有很大变化,汉代尚不觉古奥的文字,宋代以后则是日渐艰深了。于是便有“郁郁乎文哉”念成“都都平丈我”的笑话产生。

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

看来劣币驱逐良币,自古而然。唐代诗人杜甫嘲笑夔州人好经商,没有读书的习惯,有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学商旅。”把只读到《论语》看做没有学问,现今把读《论语》看做有学问,也是学术变迁,世风推移的反映。实际上近世学童读“三、百、千”和《幼学琼林》之类尚不觉难,到《论语》就不行了。我就听上代读过私塾的老人说过:“上论下论难死人。”(《论语》分上、下卷)

②终身涵咏之书

然而,《论语》又不是单纯的儿童读物,它只是文字比较浅显,又有些小故事,与一些枯燥的经书比较起来适于儿童阅读,实际上,书中多记孔子言行,多是孔子一生读书向学和阅历人生的体验,怎么能是小孩子能轻易弄懂的呢?读《论语》不仅需要学历,更需要阅历。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批评《论语》时说,这本书中只有一些“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更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其实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当时儒家经典没有介绍到欧洲多少,他对中国的了解多是通过传道士翻译的少量的传统典籍)《论语》不是简单的格言、箴言的堆积,其中许多简单话语都是有深刻文化背景的,这是需要通读“五经”才能理解的。这些经典中所记载的历史、制度、习俗,以及各类人士的思想、情感、呼声都是孔子用于教给学生的,这些必然对孔子有深刻影响。孟子说:

严。可见孔子在文化和制度上选择有高度的自觉性,是把价值摆在第一位的。

4.《论语》的定名与定本

《论语》这个名称始见于《礼记·坊记》。其中有“《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古人认为是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作品,后人对此表示怀疑,大多认为《礼记》中的文字多数是汉儒的解经之作。可是郭店楚简中所出现的《太常》一篇,其中有的文字明显截取于《坊记》,而楚墓是战国中期偏晚,竹简文字的作者当然应该更早一些,与子思(孔伋)所在时代大体相合。《坊记》创作时期的认定,从而可知《论语》之名在战国时代就有了。不过直到汉代《论语》也常被学者简称为《传》或《记》(汉儒把解释或注释经典的文字称做“传”或“记”),目的是把它们与“经”区别开来。如《史记·封禅书》中有“《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这段文字见《论语·阳货》。可知“传”即《论语》。

汉惠帝时废除“挟书之律”后,先秦儒家残存经典陆续面世。《论语》先有由齐人传出的《论语》二十二章(比现存《论语》多出《问王》和《知道》二篇)和鲁人传出的《论语》二十章(与今存《论语》相同),简称为《齐论》《鲁论》,齐、鲁二书是用当时流行文字隶书写成,称“今文本”。有人认为《齐论》《鲁论》出在汉宣帝时期,比《古论》晚了70年。还认为司马迁所引《论语》文字皆出自《古论》(出于孔壁的古文本)^①。其实汉文帝时期韩婴所作《韩诗外传》引《论语》三条,除一条与今传《论语》有异外,有两条全同^②。是知在汉文帝时期已经有了今文本的《论语》,不管它是《齐论》还是《鲁论》,或是其他的传本,如“河间本”之类。

上面说的“古论”是指用先秦篆文书写的《论语》文本。汉景帝末年发生了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即孔壁古文经典的出现。当时被封在鲁的诸侯王刘余(死后谥号鲁恭王),喜建宫殿,其宫与孔子旧宅相邻,当他扩大自己的宫殿、拆到孔子宅壁时,发现了许多写着古文字的竹简,经整理,知道这些都是孔家代代相传的儒家经典。包括《尚书》《礼记》《孝

① 见郭沂《郭店楚简与先秦学术思想》。

② 《韩诗外传》引《论语·子路》中的“必也正名乎”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尧曰》等篇残字，不过数百字而已。

《论语》之名大约在东汉逐渐固定了下来。汉章帝建初四年(79)朝廷召集诸儒于洛阳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汉章帝亲临裁决，命班固整理会议记录，称《白虎通义》，其中大量引用《论语》中语共 58 处，都称《论语》。《论语》的名字基本上固定了下来。东汉应劭的私人著作《风俗通义》也热衷引《论语》，多达 22 条。

三、《论语》地位的涨落

1. 今文学派统治下的《论语》

① 汉代儒学变迁

原始儒学有些迂阔，因此孔子栖栖一生，不为世所用，与其缺少实践性品格有关。战国末，七雄纷争，越演越烈，各个学派要想有出路、为世所用都要加强自己的实践性，以供统治者采擷。儒学也分离成为对立的两大派，孟子一派，荀子一派，两相比较应该说荀子更注重现实政治因素，后来荀子的弟子、继承者韩非把儒家中的荀学发展成为法家，并成为秦朝的国家意识形态。

汉代的儒生为了加强其学术的实践性品格走的是与注重鬼神的楚文化(秦朝基本上是被楚人灭掉，汉朝制度承秦，文化承楚)及好奇幻的齐文化结合的道路，并演化为妖气十足的今文学派。董仲舒是其代表。董倡导天人感应之说，把不谈怪力乱神的孔子，打扮为通天教主，把儒学神学化。今文学派争着运用儒学，把“《诗三百》作谏书”“以《春秋》决狱”。董仲舒之后更是编造“讖言”“纬书”，“讖言”是一些神秘主义的预言，“纬书”相应经书而来，看来似乎是辅助补充经书的，其实不然，其中也多荒诞不经之语。“五经”皆有相应的“纬书”，连平实通俗的《论语》也不例外。《论语纬》中就把孔子说成“素王受命”，颜渊是“素王”的“司徒”，子贡是“司空”。把儒学弄得乌烟瘴气，把儒家经典搞得鬼话连篇(大量的“讖纬”话语进入儒家经典的注本)。这种“实践”和“应用”在东汉末彻底破产，从此一蹶不振(鸦片战争后有个回光返照)。今文学派注释的经典大多散逸失传。